

閩南摩崖石刻研究

陳光田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闽南摩崖石刻研究

陈光田 著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闽南摩崖石刻研究 / 陈光田著 .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2018
ISBN 978-7-100-15571-7

I . ①闽 … II . ①陈 … III . ①摩崖石刻 - 研究 - 福建
IV . ①K877.4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7078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闽南摩崖石刻研究

陈光田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江 苏 凤 凰 数 码 印 务 有 限 公 司
ISBN 978-7-100-15571-7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23

定 价： 68.00 元

凡例

1. 鉴于石刻资料众多庞杂，行文中不宜使用阿拉伯数字对有关资料进行编排，而是用“△”作为标识。
2. 石刻资料中残缺不全的字，据文献资料补充的，一律外加“□”框，以示区别；对不能补充的，用空白的“□”来代替。
3. 石刻资料中凡是使用古代异体字、假借字或俗字的地方，行文中一律使用原篆，以保证资料的原始性，对其解释或说明文字，一律放在其后的（ ）中。
4. 行文中，对原始资料中结构复杂，无法输入的生僻字，均以“造字”的方式予以完成，保证原始资料的准确性。
5. 所引用的古代典籍或方志资料，一般直接在行文中注明，后面的参考文献不再标出。
6. 同一题刻者的不同题刻，只在第一处对其生平或事迹予以介绍，后文不再重复。
7. 鉴于繁体字和简体字存在不完全替代的情况，行文中个别地方保留使用了繁体字。

绪论	001
一、闽南摩崖石刻的含义与内容	001
二、闽南摩崖石刻的研究现状	004
三、闽南摩崖石刻的研究意义	006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007
第一章 厦门摩崖石刻研究	009
一、记录抵御外侮的石刻	010
二、题名记事石刻	029
三、记游写景抒情石刻	093
四、记录宗教文化石刻	145
第二章 漳州摩崖石刻研究	169
一、题名记事石刻	171
二、记游写景抒情石刻	214
三、记录宗教文化石刻	240
四、图案形石刻	248

第三章 泉州摩崖石刻研究	257
一、题名记事石刻	259
二、记游写景抒情石刻	313
三、记录宗教文化石刻	335
第四章 闽南摩崖石刻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	343
一、闽南摩崖石刻的学术价值	344
二、闽南摩崖石刻的应用价值	348
结语	353
参考文献	357
后记	360

緒 論

学术界关于摩崖石刻的界定和理解一直存在分歧，大致分为两种观点：一、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①；二、利用天然石壁以刻文记事的石刻^②。所以，摩崖石刻从狭义上来说，一般是指文字石刻，即利用天然的石壁或岩石刻文记事，属于文献学、文字学或艺术学等学科研究的范畴。广义上的摩崖石刻则是指人们在天然石壁上摹刻的所有内容，既包括各类文字题刻，亦包括石刻造像、岩画等。中国摩崖石刻的历史十分久远，据《穆天子传》所载，“天子纪功于弇山之石”，这是中国最早的石刻记载，迄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时至今日，历朝历代的摩崖石刻大量且异彩纷呈地存在于中华大地上。就其内容来说，涉及历代帝王封禅祭天、文人墨客登攀览胜、宗教发展、民间记事等诸多方面。比较知名的，如山东的泰山石刻，记录的是秦汉时期帝王封禅祭天以歌功颂德的历史史实。福建的武夷山石刻则从古代的图腾传说到底代宗教文化，从自然山水到文学艺术，从历史事件到旅游文化均有涉猎。摩崖石刻是记录中国文化发展历程的重要实物资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珍宝，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非物质财富。

一、闽南摩崖石刻的含义与内容

所谓闽南，一般是指以厦门、漳州和泉州等为代表的福建南部地区，虽然今龙岩新罗区、漳平市的大部分地区曾隶属于漳州市，且在方言特点和人

^①（清）冯云鹏：《金石索》，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

^②徐自强、吴梦麟：《古代石刻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

们的生活习俗等方面均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但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说，它们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闽南金三角”地区，所以将其排除在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同经济、文化相对较为发达的中原地区相比，闽南地区因地理位置、交通不便等因素的影响，人们长期生活于相对封闭的状态，逐渐形成一个说闽南方言且生活习俗存在很大相似性的自然生活区域，从而发展成为今天人们所熟知的“闽南”地区。就其摩崖石刻而言，它们既是中国古代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独特的区域特色，将其统称为“闽南摩崖石刻”的目的就是为了凸显其地区特色。从时间上来说，该地区既有商周时期的石刻遗存，也有唐宋以来乃至近现代的题刻；从字体上来说，既有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也有后来的小篆、隶书、楷书和行书等；从内容上来说，既有历代仁人志士坚定守卫海疆，抒发其爱国豪情的题刻，也有文人墨客题名记事以及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内容。闽南摩崖石刻是本地区发展历史的真实记录，可以为闽南区域历史和区域文化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厦门地区留存至今的摩崖石刻数量十分巨大，大部分分布在南普陀寺、鼓浪屿、万石植物园等旅游景点之内，这可能因其为旅游胜境或受宗教文化的影响有关，而且这些景点内的一些题刻具有重要的代表性和研究价值。如厦门云顶岩成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的“天际”石刻，不仅是对此处岩石耸立，直插云霄景象的形象描写，也是厦门岛现存已知最早的摩崖题刻。位于鼓浪屿上一处民宅后侧的《重兴鼓浪屿三和宫记》题刻，字幅约70平方米，不仅是面积最大的石刻，也是记录台湾历史人物王得禄在大陆发展历程的重要史料。位于碧山岩成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碧山岩新楼记》，全文有七百六十多字，是文字量最大的一处摩崖题刻，内容详尽地介绍了碧山岩殿宇楼阁的修建经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位于南普陀寺后山脚的岩石上，于清光绪乙巳年（1905年）镌刻而成的“佛”字石刻，面积近十平方米，是厦门地区字体最大的摩崖石刻，它已成为南普陀寺内的代表性特色景观，知名度远播海内外。位于鼓浪屿上菽庄花园内静卧于海涛边的菽庄花园主人、台湾爱国人士林尔嘉夫人——龚云环题镌于1919年的一首七言绝句诗刻，则是厦门地区唯一的女性题镌的石刻，这在封建礼教影响较深的年代实为罕

见，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同时，在厦门众多的摩崖题刻中，有许多内容属于在社会、文化、军事等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历代志士所留。譬如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戚继光题留于万寿岩岩壁上的“俞戚”诗刻。清末最后一位武状元黄培松，题于日光岩上的“谈瀛”。一代高僧弘一法师在南普陀寺后侧五老峰兜率陀院留下的“瑜伽泉”“甘露井”等题刻。蔡元培先生在日光岩郑成功寨门遗址岩石上题留的“叱咤天风镇海涛，指挥若定阵云高。虫沙猿鹤有时尽，正气觥觥不可淘”诗刻。著名爱国将军，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军长的蔡廷锴，在日光岩郑成功寨门遗址前岩石上所题留的“心存只手补天工，八闽屯兵今古同。当年故垒依然在，日光岩下忆英雄”诗刻。早期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期间曾任讨袁总司令的李烈钧，题留于鼓浪屿日光岩上的“日月俱悬”。曾任国民政府主席、立法院长等职的胡汉民，题留于日光岩西侧岩壁上的“光复台”。台湾著名爱国人士李友邦在南普陀寺藏经阁东侧巨岩上题留的“复疆”。现代著名书法家、诗人罗丹，在太平岩寺右侧巨岩上留下的“筑亭纪游”题刻等等。总体而言，“保卫海疆”的爱国主题和赞颂厦门优美景致是厦门摩崖石刻的两大特色，厦门岛外的集美区、同安区、翔安区和海沧区等地，亦有数量可观的摩崖石刻，主要涉及题名记事、历代文人的抒怀之作或宗教文化等内容。

漳州是一座拥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境内的摩崖石刻数量巨大，其中以龙海云洞岩和华安县的“仙字潭”石刻最具有代表性。云洞岩位于漳州市龙海步文镇蔡坂村，岩内怪石嶙峋，洞壑绵密，有月峡、仙人迹、千人洞等胜景四十余处，从五代至清道光年间的诗、文、联记等近两百处摩崖题刻就保留在这些景点周围的岩壁或岩石上，如五代时期的道人许碏的“许碏寻偃月子至此”题刻，南宋朱熹留下的“溪山第一”“石宝清隐”。明代丰熙题刻的“鹤峰山云洞游记”，林达的“鹤峰山云洞续记”，以及明代四川参政周瑛的“云洞”和郡守张鹏的“寒泉”等等。同时，还有王慎中、蔡文、韩擢、黄道周、林魁、刘天授、吴仕典、沈锐等文人墨客的题刻，其中多处遗存被选入清代的《三希堂石渠宝籍法帖》。位于云洞岩峰

顶绝壁上的“搔首”二字题刻，字长宽各有两米，是此地字幅最大的摩崖石刻。而丰熙的“鹤峰山云洞游记”题刻，有一千多字，是字数最多的题刻，内容涉及此地多处题刻的来历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附近岩壁上还留有记录清乾隆庚寅年（1780年）的洪水水位题记等，云洞岩石刻被誉为“闽南第一历史碑林”，当属实至名归。地处华安县的“仙字潭”摩崖石刻是福建地区乃至全国最古老的石刻，属于商周时期的石刻遗存，也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现存文化符号最多、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摩崖石刻。隶属于漳州市的漳浦县、南靖县、诏安县、东山县、平和县、龙海市等地，均有很多遗留的历代石刻，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漳州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参考。

泉州号称“泉南佛国”，其近郊的清源山、南安的九日山等地均有大量的摩崖石刻遗存，是本地区摩崖石刻中的重要代表。其中，清源山上有老君岩、弥陀岩、瑞象岩等著名石刻，被誉为“闽海蓬莱第一山”，全区现存摩崖石刻近六百处。从内容和字体来看，有内涵丰富的诗刻、碑刻、匾额等，篆、隶、楷等各种字体兼备。九日山中古迹遍布，摩崖题刻多集中于西峰东坡和东峰南麓，最珍贵的为宋元祈风石刻群，是研究宋元时代泉州海外贸易的重要参考资料。同时，隶属于泉州的德化县、南安市、安溪县、永春县、晋江市等地也拥有数量不等的摩崖石刻，如德化县的九仙山是全县摩崖石刻为数最多、分布最为集中的地方，已发现四十多处，此外，还有石牛山、金龟石，以及美坑洋等地，均有不同时代的摩崖石刻遗存。如2009年，考古工作者曾在南安市洪濑镇发现一处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宋代摩崖观音石刻雕像等。据统计，泉州地区的摩崖石刻不但种类齐全，而且年代久远，有不少属于唐宋时期的遗存，比厦门地区最早的石刻遗存还要早数百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闽南摩崖石刻的研究现状

摩崖石刻是中国古代文献和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与组成部分，也是记录闽南地区发展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对我们了解和研究地区文化及其发展历程

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闽南摩崖石刻的研究还基本停留在初始阶段，学术成果还是凤毛麟角，对其在促进地区文化发展和交流中的作用几乎无人提及。目前，我们见到的相关著作主要有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编写的《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一书，该书主要侧重于对“仙字潭”石刻是图画还是文字的讨论，并收录了三十多幅原始资料的照片，该书可以为仙字潭石刻的系统研究提供比较全面的参考。梁继武的《摩崖荟萃》（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是一本导读性质的通俗读物，内容主要属于对部分摩崖石刻的作者介绍、词语解释或内容浅说等，但较少涉及摩崖石刻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厦门市政协组织编著的《厦门摩崖石刻》（福建美术出版社，2001年），全书共收录了厦门地区四百幅左右的历代摩崖石刻资料，图文并茂，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但对一些石刻的作者或题镌背景没有交代，对其思想内涵或文化价值讨论较少。许添源等人编写的《清源山摩崖石刻选粹》（中华书局，2003年）属于影册性质的导游书或普及读物，对摩崖石刻的文化内涵及其学术价值等基本没有涉及。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的《福建摩崖石刻精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对全省各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摩崖石刻均有所涉猎，其中包括闽南地区的部分内容，且原始图片比较清晰，便于我们学习和参考，但遗漏较多。近年来，漳州和泉州的地方文管部门先后组织编写了《漳浦摩崖石刻》《清源山摩崖石刻》等，均对当地的摩崖石刻资料进行了汇编和简要介绍，但仍侧重于旅游宣传等方面。所以，闽南摩崖石刻研究尚不充分，其文化价值等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挖掘。

近年来，随着旅游事业和区域文化研究的日益发展，人们对闽南摩崖石刻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经常有一些关于摩崖石刻的照片或关于新发现摩崖石刻的报道，但缺乏对其进行学术讨论和研究。目前，有关对闽南摩崖石刻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也较少，而且主要局限于某一具体石刻。如刘蕙孙的《福建华安汰溪摩崖图像文字初研》（《福建文博》，1982年第1期）和一彤的《千古之谜：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漳州职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这两篇文章主要是针对“仙字潭”的性质或特点进行了讨论。陈国强

的《漳州华安汰溪摩崖石刻与高山族》（《福建学刊》，1988年第5期）认为“仙字潭”是台湾高山族的文字源头。经纬的《福建“仙字潭”图像文字与台湾原住民》（《两岸关系》，1999年第4期），根据“仙字潭”图像文字的构造特点和台湾原居民的生活习俗，得出台湾原住民来源于福建的结论。笔者在研究闽南摩崖石刻过程中所写的《论华安“仙字潭”石刻文字的性质与学术价值》（《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1期）和《摩崖石刻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研究——以厦门为例》（《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版）》，2013年第4期）分别对华安“仙字潭”石刻的性质和学术价值，以及厦门摩崖石刻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但是，站在学术角度对闽南摩崖石刻进行系统整理、研究的著述尚未见到。台湾或海外学者亦曾多次到华安考察“仙字潭”石刻，并进行了多次学术讨论，所以，闽南摩崖石刻虽然很早就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兴趣，但研究不够全面，因此对闽南地区的摩崖石刻进行系统整理，并对其学术价值及应用价值进行一番系统讨论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闽南摩崖石刻的研究意义

闽南摩崖石刻内容中既有历代仁人志士抗击外来侵略的史实记录，又有文人墨客寄寓人生哲理或抒发处世情怀的格言警句，还有赞美山川秀丽、造化神工的刻辞，同时也有福建早期土著居民生活记事的遗迹。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闽南摩崖石刻就是一部记录本地区诸多方面发展的史书，并且具有文献和文物的双重功能，通过对其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我们可以从中发现闽南摩崖石刻对中原摩崖石刻的传承及其独特的地方特色；就其内容而言，摩崖石刻具有文字学、文献学、民俗学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可以为闽南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闽南地处东南沿海，风景秀丽，是旅游度假的佳地，而且摩崖石刻大多留存于名川大山或旅游胜地之中，在无形之中为该地区增添了文化韵味。闽南地区处于同台湾和东南亚地区交往的最前沿，台湾或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呈

现出一定的闽南文化特点，是闽南文化的延伸和发展。近年来，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摩崖石刻资料可以为丰富两岸文化交流提供有益的补充和参考，进而成为两岸文化多元化交流中的重要一元。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本研究在充分拥有闽南摩崖石刻资料的基础上，以田野调查法、文献解读法等对其进行系统的分类整理，并对其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及学术价值进行深入探讨，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穷尽原始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所以课题组五人分赴闽南各地，把摩崖石刻的原始资料搜集齐全是我们整理与研究工作的第一步。

第二，赴各地图书馆、博物馆等，查阅地方志资料并向有关专家请教和讨论，并把摩崖石刻资料同传世的文献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和讨论。

第三，对每一处摩崖石刻的文化内涵及其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系统讨论，并对研究中的不足进行总结或说明。

第一章 厦门摩崖石刻研究

厦门旧称为鹭岛、嘉禾里、嘉禾屿、中左所等，“厦门”这一称呼始于明代，洪武二十年（1387年），江夏侯周德兴在厦门岛建城，取名“厦门”^①，其寓意即国之大厦之门。同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原地区相比，厦门地区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相对较迟，据《同安县志》等文献记载，厦门有具体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唐代开始的。公元933年，同安开始建县，厦门隶属于同安，从此，厦门地区的发展真正进入文明时代。由于历史发展和自然条件等多方面因素，详细记录该地区发展历程的传世文献资料并不是很多，作为重要历史文物和珍贵文化遗产的摩崖石刻，无疑成为我们了解厦门发展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一、记录抵御外侮的石刻

自明朝初年厦门命名以来的六百多年里，厦门一直同守卫海疆和抗击外来侵略紧密联系到一起，历代中华儿女在这块热土上书写着抗击外来侵略、保卫海疆安宁的壮丽诗篇，抒发着爱国豪情。石刻中既包括记录抗击荷兰殖民者或倭寇入侵事迹的内容，也有抒发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决心和热爱祖国情怀的题刻，可以说，数量巨大的摩崖石刻几乎可以构成一部区域军事史，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历代厦门英雄豪杰抵抗外侮的历史。

△ 徐一鸣等攻剿红夷题刻

今思明南路鸿山公园鸿山寺后侧的岩石上，有徐一鸣等人楷书直题而成的关于攻剿荷兰侵略者（红夷）的石刻。文曰：“天启二年十月二十六等

^①（清）周凯：《厦门志》，（清）道光十二年（1832）版，第1页。

日，钦差镇守福建地方等处都督徐一鸣、督游击将军赵頫、坐营陈天策，率三营浙兵把总朱樑、王宗兆、李知纲等到此攻剿红夷。”

17世纪以降，荷兰殖民者不断武装进犯福建的厦门至铜山（今东山）一带沿海地区，中国军民坚决抗击。明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明政府命福建都督徐一鸣等率军驻守厦门，取得攻剿红夷的胜利之后，诸将到鸿山寺游览，并留此题刻以纪胜事。题刻同《厦门志》所载的“冬十月，福建总兵官徐一鸣率兵驻中左所（今厦门）剿红夷”，相印证，题刻是记录明代厦门军民反抗外来侵略的重要历史文物。

徐一鸣，生卒年不详，字伯和，晚年号禄江迁人，醴陵（今湖南醴陵）人，明正德十二年（1566年）进士，历任官吏部主事、江西提学、总兵、都督等职，著有《禄江诗集》。据乾隆年间《福建通志》载，徐一鸣曾于万历年间（1573—1619）任镇守总兵官。

△ 赵纾督征红夷石刻

虎岩寺后山的岩壁上，有明代赵纾楷书直行而成的记事题刻。文曰：“天启癸亥冬，晋阳赵纾督征到此。”

据史料记载，福建巡抚南居益、总兵俞咨皋、总兵谢隆仪、同知赵纾、何舜龄等于明天启癸亥年（1623年），率兵攻剿红夷，取得大捷，时任漳州海防同知的赵纾为此镌留题刻以示纪念。

赵纾，生卒年不详，江西乐平人。明天启年间，曾任漳州海防同知，是一位抗击荷兰殖民者的爱国将领。

